

# 幼稚園教育政策下香港優質幼稚園教育效能之顧問研究

## 摘要

2022年2月

香港教育局於 2017/18 學年開始實施新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以下簡稱「政策」）。政策旨在提升香港幼稚園教育的質素，並為學童提供優質和易於負擔的幼稚園教育。

### 目的

1. 此「幼稚園教育政策下香港優質幼稚園教育效能之顧問研究」終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摘要，為是項追蹤研究於政策實施前（2017年6月至9月）、政策實施的第一階段（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第二階段（2019年4月至9月）和第三階段（2019年6月至2020年11月）的研究結果的總結。
2. 研究團隊以實施研究理論（Implementation Research）和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見圖 1）為框架，採用多樣方法（Multi-method）及多信息設計(Multi-informant design)，涵蓋不同持份者參與研究。是次研究共有三個目標：
  - (i) 檢視政策下香港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效能；
  - (ii) 識別幼稚園的良好經驗和尚待改善之處；及
  - (iii) 探討促進學校發展優質幼稚園教育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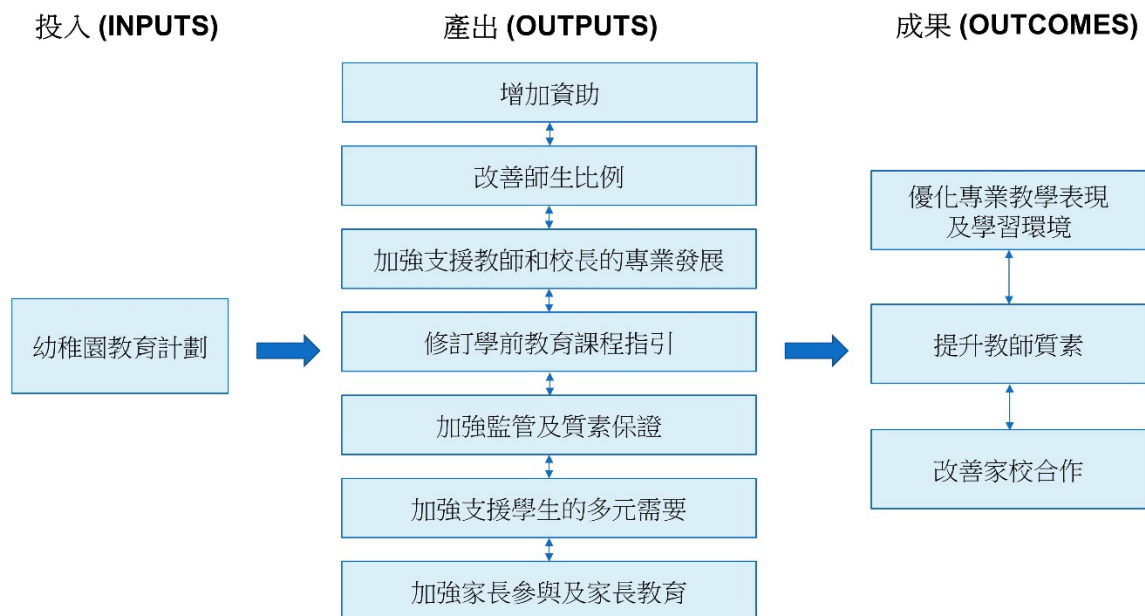


圖 1：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

3. 此摘要總結了(i) 課室觀察、(ii) 校長、教師和家長的問卷調查，以及 (iii) 校長、教師和家長訪談所得的研究結果。

## 研究背景

- 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以下簡稱「計劃」）的幼稚園均符合資格參加是次研究。研究團隊先將幼稚園按地區劃分（Stratified by district），再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和替換學校樣本（Random Sampling with Replacement），確保有足夠符合選擇準則的幼稚園數目。選擇準則包括學校的規模和照顧學生多元需要的額外支援，特別是領取支援非華語學童的額外資助（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和參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OPRS）<sup>1</sup>的幼稚園。
- 在第一階段，同意參與研究的幼稚園有 121 所。研究團隊原定以招募 100 所幼稚園為目標，但為了提高有 100 所幼稚園能完成三個研究階段的可能，研究團隊額外招募了約 20 所幼稚園。校長（第一階段：121 所幼稚園；第二階段：114 所幼稚園；第三階段：106 所幼稚園）和教師（第一階段：121 所幼稚園的 1522 名教師；第二階段：114 所幼稚園的 1446 名教師；第三階段：108 所幼稚園的 1313 名教師）完成三個階段的問卷。圖 2 顯示研究第一部分(Study 1)採用的研究設計和參與人數。



圖 2：研究第一部分採用的研究設計和參與人數<sup>2</sup>

- 研究團隊從研究第一部分(Study 1)原先招募的 100 所幼稚園中（即招募額外學校前）選取 25 所幼稚園作第二部分 (Study 2) 的深入研究。在政策實施前階段(Pre-policy stage)，研究團隊對上述 25 所幼稚園中的 15 班高班（K3）進行課室觀察，以了解政策實施前幼稚園的概況。在其後的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研究團隊從這 25 所幼稚園選取兩個級別進行課室觀察（第一階段：25 班幼兒班（K1）和 25 班低班（K2）；第二階段：25 班幼兒班（K1）和 25 班高班（K3）；第三階段：25 班低班（K2）和 19 班高班（K3））。在政策實施前階段，參與深入研究的 25 所幼

<sup>1</sup> 政府於 2015 年推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並在 2018/19 學年把計劃納入常規服務。計劃下，非政府機構的跨專業服務團隊為就讀於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輕度殘疾幼兒提供到校服務。跨專業服務團隊亦會為教師／幼兒服務工作人員和家長／照顧者提供支援。

<sup>2</sup> 研究團隊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階段分別從 120、113 和 106 位校長中蒐集了 121、114 和 106 份問卷。因為有一位校長同時擔任兩所幼稚園的校長，故校長人數和問卷數目有別。

稚園校長都填寫問卷並個別接受訪談。在其後各個階段（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研究團隊與這 25 所幼稚園的校長、接受課室觀察的班別的一位教師和一位家長分別進行訪談（50 個班別，進行各 50 個教師和家長訪談）。接受課室觀察的班別的家長也填寫了問卷（第一階段：879 位家長；第二階段：798 位家長；第三階段：431 位家長）。圖 3 顯示深入研究部分(Study 2)採用的研究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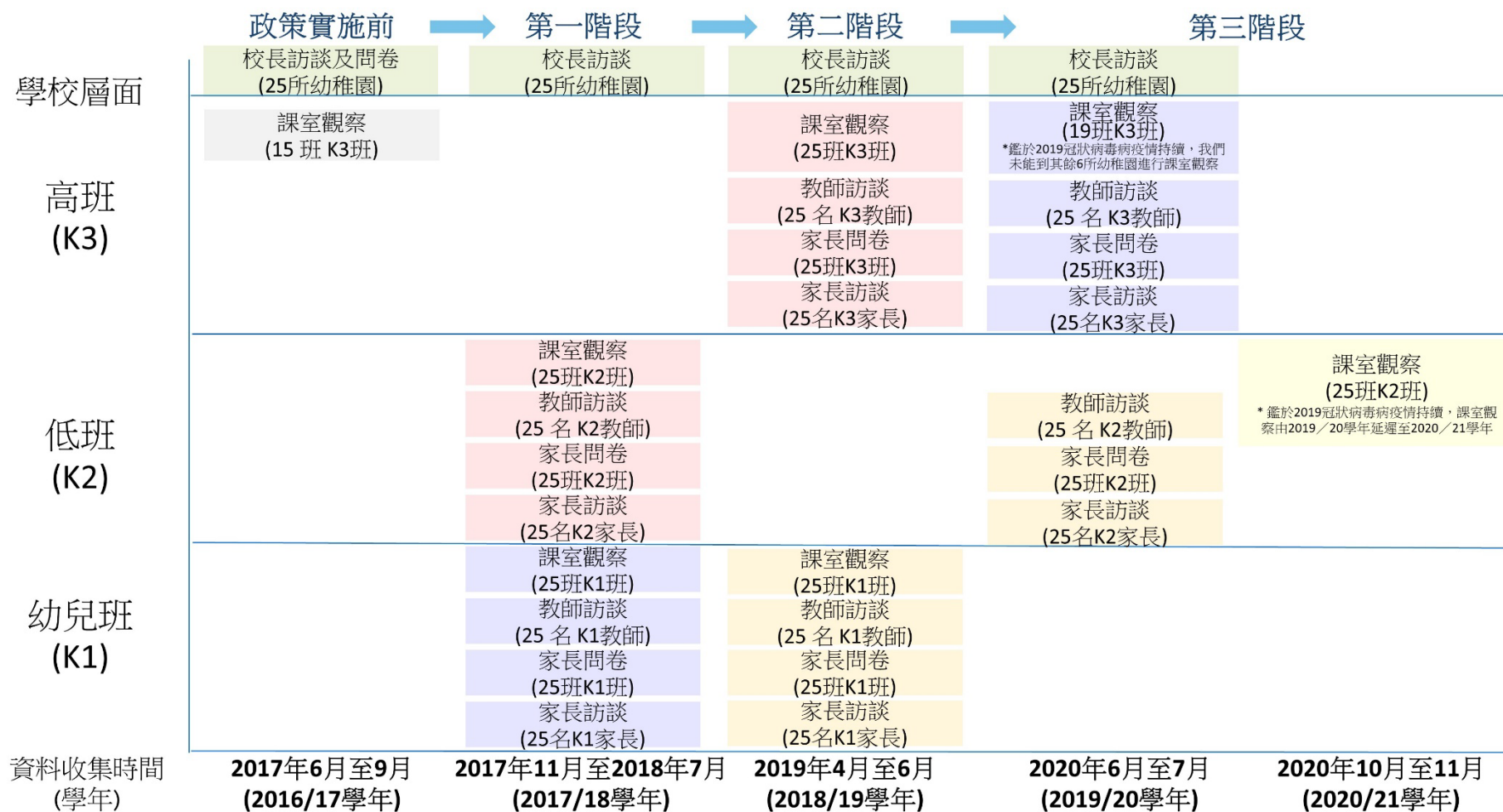


圖 3：深入研究部分(Study 2)採用的研究設計

7. 課室觀察的分析包括四個階段(即政策實施前和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的數據，讓我們可作各階段之間的比較，須注意的是研究團隊在第一至第三階段觀察不同的班級：第一階段觀察幼兒班（K1）和低班（K2）；第二階段觀察幼兒班（K1）和高班（K3）；而第三階段觀察低班（K2）和高班（K3）。預計幼稚園會為高班（K3）學童升讀小學作準備，而教師也會配合學童成長的轉變。是次研究設計觀察不同級別，確保能找出政策在這幾年間對不同級別的影響，並作出不同班級之間的比較。
8. 由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研究團隊在課室觀察時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 - 延伸（ECERS-E）<sup>3</sup>、早期學習環境量表（MELE）<sup>4</sup>和持續共享思維和情緒健康評量表（SSTEW）<sup>5</sup>三個評量工具，分別量度課程質素、課室整體和個別環境的質素，以及發展兒童思維技巧的教學質素。研究團隊在政策實施前也使用了完整的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 - 修訂版（ECERS-R）<sup>6</sup>觀察高班（K3）的課室。而在第三階段，研究團隊使用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 - 修訂版（ECERS-R）的四個範疇觀察高班(K3)的課室。我們把這四個階段（政策實施前以及第一到第三階段）以三個可靠的評量工具（ECERS-E、MELE、SSTEW）蒐集得來的數據進行因素分析，以便更簡潔地分析課堂質素的改變。我們分析後得出四個因素，顯示三個評量表能從四個維度評估課室的質素。研究團隊比較以下四個因素／維度<sup>7</sup>在不同階段的得分：

因素一：支援兒童社交情緒和認知發展

因素二：學習環境、照顧學童多樣性和室內自選活動

因素三：大自然與生活

因素四：融合性、分組活動和師生互動

9. 研究期間，香港經歷社會動亂及疫症以致停止面授課堂。這些不可預知的情況導致第三階段參與研究的樣本數目較預期少，部分研究結果也未如預期。研究結果雖反映實況，但我們認為第三階段的課室觀察未能讓我們為幼稚園的政策作公平的評價。從實施政策前到研究第二階段的課室觀察數據顯示，課堂質素有改善的趨向，但是從第二到第三階段，部分正面的趨勢減少，我們相信數據的變化是受學校停止面授課堂、額外的衛生措施和要求社交距離所致。故此，我們不可因教師在第三階段較之前提供較少的活動而對他們作出不公平的評價。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幼稚園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在第三階段比第二階段有所加強，而幼稚園為家長提供的活動則減少，相信這些現象很可能是因學校停止面授課堂所致。

---

<sup>3</sup> Sylva, K., Siraj-Blatchford, I., & Taggart, B. (2010). *Assessing quality in the early years: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Extension (ECERS-E): Four curricular subscales*, rev. 4<sup>th</sup> e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up>4</sup> Measuring Early Learning Quality and Outcomes (MELQO) Project. (2016). *Measure of Early Learning Environments (MELE) Module*. UNESCO. Washington, DC.

<sup>5</sup> Siraj, I., Kingston, D. & Melhuish, E. (2015). *Assessing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Sustained Shared Thinking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SSTEW) Scale for 2-5-year-olds Provisi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Trentham Books.

<sup>6</sup> Harms, T., Clifford, R. M., & Cryer, D. (2005).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up>7</sup> 研究團隊參考課室觀察所用的評量工具(ECERS-E, MELE, SSTEW, ECERS-R)中的範疇和《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的主導原則及相關的學習範疇，例如大自然與生活，以擬訂因素(Factor)的名稱。

## 研究結果概述

就六個研究問題的結果，簡述如下：

Q1. 政策對學生的學與教（例如課程規劃、教學法、學童參與學習活動）有甚麼影響？

10. **比較三個階段，課堂質素在某些範疇有所改善。**課堂質素在因素一支援兒童社交情緒和認知發展、因素二學習環境、照顧學童多樣性和室內自選活動，以及因素四融合性、分組活動和師生互動的分數由政策實施前至第二階段逐漸上升，然後在第三階段稍為下跌。綜觀三個階段，因素三大自然與生活在第一階段的得分最高，第二階段稍為下跌，而第三階段再顯著下跌。這顯示直至第二階段，課堂質素在許多方面均有改善，包括支援兒童社交情緒和認知發展、環境、照顧學童多樣性和融合性等的互動質素。第三階段的倒退或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措施限制了活動和師生互動有關。
11. **學校課程因採用新制定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而有所改變。**從校長的回應可見，絕大部分學校（約 90%）加強了遊戲中的自由探索的元素和推動「從遊戲中學習」。學校課程的改變還包括更重視照顧學童的多樣性、加強推展品德教育和推動共融文化等。
12. **比較三個階段，教師認為《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對他們教學的影響有所增加。**根據 510 名完成三個階段問卷的教師的回應分析，在越後的階段，他們認為《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對其影響越深。大部分教師認同「從遊戲中學習」的益處和指出有趣的學習環境促進兒童學習。
13. **問卷調查及訪談均反映「從遊戲中學習」越趨重要。**從分析各階段的問卷結果可見，大部分校長和教師都贊同遊戲的重要。大部分受訪校長和教師指出他們按《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作改變，包括修訂活動日程，分配更多時間予兒童進行自由遊戲、探索、體能、音樂和自選活動。學校透過推行更多說故事、閱讀圖畫書、角色扮演、圖卡遊戲和「自由遊戲日／周」等活動，促進學校由教師主導改變為以兒童主導的學習模式，並為兒童提供更多機會進行自由探索和從遊戲中學習。有些幼稚園重新規劃園內的實體遊戲空間，並增加興趣角數目供兒童選擇。有些幼稚園在學習環境中加入新的物料和資源，如大玩具、建構性玩具、特別的積木、大車輪、可回收物料，增加興趣角的遊戲元素和像真程度，以促進兒童從遊戲中學習。有些校長和教師則指出學校已為幼兒減少課業量和寫字，或修訂課業的形式。從有些家長訪談得知，學童的書寫量減少，遊戲時間則有增加。「從遊戲中學習」在幼稚園更為普遍，然而，仍有校長和教師不確定如何在課堂實踐「遊戲為本」的教學法。

Q2. 政策對照顧學童的多元需要（例如教師認識他們的個別需要、支援他們的學習、與相關專家／外間組織協作、相關教師培訓等）有甚麼影響？

14. **比較三個研究階段，越來越多幼稚園向非華語學童提供額外支援。**幼稚園向非華語學童提供額外支援，包括分配專責教師或教學助理支援非華語學童、參與校本支援計劃、教師運用課堂策略以及向外間機構購買服務。有提供額外支援的幼稚園大多數是獲得支援非華語學童資助的幼稚園。研究進行期間，越來越多教師和校長在問卷調查中表示他們為非華語生提供支援，包括設計校本教材、調適課程活動、營造豐富的中文學習環境、鼓勵非華語學童和華語學童互動和與家長溝通以了解學童需要。與政策實施前階段相比，幼稚園在研究期間為非華語學童提供了更廣泛的支援。在表示子女於學校獲得支援的非華語家長當中，大部分均表示支援有效或非常有效。
15. **整體而言，幼稚園向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更多的支援。**通過縱向分析三個階段的教師和校長的問卷，我們發現越來越多受訪者指出在研究期間曾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一定的支援。在眾多不同的支援方式中，較常見的有聯繫家長以了解學童需要、引入外間支援、提供適切支援和營造共融環境。綜觀三個階段，越來越多的受訪校長表示獲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專業支援及駐校社工的服務。受訪校長和教師均表示與外間專業人士協作，以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童，這顯示幼稚園從外間專業人士獲得更多支援以協助有特殊需要學童的發展和學習。此外，在問卷表示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家長中，有越來越大比例的家長表示他們從幼稚園中得到支援，當中絕大部分認為這些支援非常有效或有些效用。從第二、第三階段的課室觀察可見，課室共融性和多元化的素質有提升，這可能是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中各個因素互動的結果。
16. **比較三個階段，教師對於支援學童多元需要的信心有提升。**教師問卷和訪談問題均對應幼稚園政策的目標並或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因素有關。根據 510 名完成三個階段問卷的教師的回應分析，他們的觀感和經驗有改變。大多數教師對支援學生多元需要（例如有發展遲緩危機、有特殊需要和非華語學童）感到頗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而教師對支援學生多元需要的自信程度在各階段逐漸上升。

Q3. 政策對學校管理與組織（例如透明度、資源分配的整體規劃、學校文化和氛圍等）有甚麼影響？

17. **校長在訪談中表示幼稚園以不同方式運用資助，提升學與教質素。**資助的運用包括聘請額外員工、支持幼稚園日常營運、改善設備和設施、購買玩具和教材，以及組織學生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回顧計劃由 2017/18 學年起實施的三年間，部分校長表示他們能夠聘請額外教師和職員，提升了教師薪酬，能讓教師有空間為教學做準備、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和與家長溝通。

18. **校長、教師和家長對學校的文化和氛圍有正面的評價。**校長和教師都認為學校在一定程度上讓教師參與幼稚園的決策。家長普遍欣賞教師有愛心、會關心和照顧他們的子女，並會與他們跟進子女的需要。有些家長更表示欣賞校園環境和校內衛生措施，又表示他們的子女喜歡上學。在第三階段，更多家長表示他們喜歡學校的教學，包括學校課程或教學理念、教學活動／策略，以及具資歷和有經驗的教師。

*Q4. 政策對教師專業發展，包括與教師發展有關的學校政策(例如教師架構/職級)，有甚麼影響？*

19. **越來越多教師願意花更多時間參加專業發展活動。**在首兩個階段，從校長問卷可見，校長期望教師在該學年參與超過 20 小時專業發展活動的百分比有增長（第一階段：62%，第二階段：67%，第三階段：49%）。教師問卷也有類似的發現，計劃在該學年參與超過 20 小時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師的百分比從第一階段的 45%增加到第二階段的 53%，然後下降至第三階段的 46%。同樣，從 510 名完成三個階段問卷的教師可見，他們計劃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平均時數於第二階段較第一階段增加，而第三階段較第二階段減少。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專業發展活動可能較以往少，而該學年預計的專業發展時數也可能相應較少。綜觀三個階段，超過 90%教師同意專業發展活動切合他們的需要，有助他們的教學，學校也鼓勵教師參與這些活動。

20. **大多數幼稚園讓教師在工作時間內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有些校長在訪談中提及在幼稚園政策實施後，學校聘請更多教職員，給予教師空間於工作時間內參與專業發展活動。超過 90%的教師在問卷中同意幼稚園為他們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作行政安排。這與教師和校長訪談的結果一致。

21. **幼稚園有採取措施以支援新入職教師。**幼稚園為新入職教師安排師徒計劃、入職啟導、觀課、課後討論或考績會面等。部分幼稚園會在人手編配上作安排，支援新入職教師，例如讓新教師夥拍較有經驗的教師負責同一班的教學。值得注意的是，校長比教師更多提到為新入職教師提供的支援，這可能是因為並非所有教師都有參與相關支援。

22. **教師把在專業發展活動所學的，應用在教學和課程發展方面。**校長在訪談時表示，教師把在專業發展活動所學應用在課堂上。有些幼稚園要求教師在會議中分享他們在專業發展活動的得著，有些則安排分享如何實踐所學，也有教師就所學撰寫書面報告。有些校長或資深教師也會跟這些教師討論，鼓勵他們把專業發展活動所學應用在工作上。有些教師在接受特定範疇的專業培訓（例如支援有特殊需要學童）後，會負責學校相關的活動。從教師訪談可見，教師在課室中應用從專業發展活動所學，包括支援有特殊需要學童、遊戲、音樂、語文、說故事以及與科學和數學相關的範疇。此外，教師在規劃課堂時應用所學的策略，如加強活動中兒童主導的元素、改善課室的環境或在不同學習範疇中加入遊戲元素。

23. **從首兩個階段可見，對專業發展活動有較高期望的幼稚園的課堂質素較高。**在第一階段，校長期望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與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 - 延伸



(ECERS-E) 與持續共享思維和情緒健康評量表 (SSTEW) 的結果有顯著的關連，在第二階段則只和持續共享思維和情緒健康評量表 (SSTEW) 有關連。在第三階段，校長的期望沒有與任何評量的結果有關連。以上結果顯示，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越多，課室觀察中的師生互動的質素越高。

*Q5. 政策對家長的參與有甚麼影響 (例如更多樣的溝通渠道、推動家長教育) ?*

24. **幼稚園在所有階段普遍能展現良好的家校合作文化。**大多數教師和校長在問卷中均正面肯定與家長的溝通。家長在訪談中表示欣賞教師正向的特質，包括友善、有愛心和責任感。在第三階段，有更多家長表示欣賞學校的教學 (例如教學活動、學校課程)。
25. **幼稚園以多元化的溝通途徑與家長保持聯繫。**校長和教師除了運用傳統的方式，如家長教師會議、家校通訊、電話／書面通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非正式會談和學生手冊，就有關兒童的發展和學習與家長溝通外，有更多的校長和教師在第三階段表示採用電子方式與家長溝通，如內聯網、電子郵件、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等。學校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停止面授課堂，這結果不足為奇。
26. **幼稚園持續為家長提供涵蓋各樣主題的家長教育和家長參與活動。**大部分幼稚園每年均定期為家長提供數次研討會／工作坊、聯誼、家長義工等活動。常見的家長教育的主題包括兒童和家長的情緒、親子關係、幼小銜接，以及推廣特定的學習範疇。學校活動則包括學校旅行、家長義工和在校的親子活動。有些家長在訪談中指出，通過參與這些家長教育和學校活動，可掌握更多育兒、教養子女的技巧，或他們子女的特點。這說明以上活動能增進家長對子女和育兒的認識。從 25 所完成政策實施前至第三階段問卷的幼稚園可見，每月舉辦一次或以上家長工作坊／研討會的幼稚園數目略為上升，反映舉辦家長工作坊／研討會的數目在政策實施後略有增加。
27. **幼稚園持續改善與非華語家長的溝通。**與首兩個階段比較，教師採用了不同的策略與非華語家長作日常溝通，故在第三階段較少教師表示與非華語家長溝通有困難。有些幼稚園為家長提供文件的英語翻譯本。曾接受三個階段訪談的非華語家長表示，他們在有需要時能夠聯繫學校，與班任老師、非華語教師或其他教職員保持恆常溝通。然而，語言仍然是非華語家長與學校順暢溝通的障礙。在一些非華語家長的訪談可見，他們在理解學校通告需要協助，而語言障礙亦窒礙非華語家長參與學校的家長活動。
28. **不同原因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在首兩個階段的訪談中，約四分一的受訪家長表示沒有參加任何家長活動。第三階段則有 36% 的受訪家長表示沒有參加任何家長活動。主要是因為家長缺乏時間，其他原因包括在第三階段基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安排。受訪的非華語家長表示，學校活動和通告一般是中文，參加學校活動對他們來說有一定困難。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受訪的非華語家長表示他們因語言障礙而未有參加任何家長活動。

Q6. 學校有哪些因素有助發展優質幼稚園教育？

29. 校長在首個階段報告，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與整體課堂質素有正向的關係。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與課堂質素中的特定範疇成正向關係，包括支援兒童社交情緒、認知發展和大自然與生活的學習。
30. 在第三階段，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的安排的觀感與他們的課堂質素有正向的關係。這些觀感包括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是否符合他們的需要、是否有利教學和培訓是否足夠有關。而學校是否鼓勵或有否作出行政安排，好讓他們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也會影響教師對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看法。
31. 在第三階段，家長參與和家校溝通與各階段的整體課堂質素有正向的關係。我們發現在第三階段，當教師傾向認同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以及「教師、家長與校長有持續的溝通和協作」，該幼稚園在各階段均有較佳的課堂質素。

研究限制

32. 我們的觀察反映到訪幼稚園當天所進行的活動，或許未能反映課程的全貌。當天的教學視乎當時的學習主題或課程大綱已編排的活動，例如有些有關社區的主題或與語文學習或個人與群體的範疇有較密切的關係，而其他與自然有關的主題則或與大自然與生活的學習範疇較有關連。所以，幼稚園課堂質素的評估與實際教學可能存在誤差。
33. 從訪談、問卷與課室觀察所得的數據可能存有差異。研究期間，校長和教師指出從遊戲中學習日益重要，但在課室觀察未有此發現，這可能因為觀察的評估工具針對整體和課堂質素的特定範疇，故不足以敏銳地反映所有與政策相關的改變。
34. 詮釋研究結果時需留意各階段蒐集數據的時段。校長、教師和家長在接近學期完結的時段（例如六月至八月）填寫問卷或受訪，相比學年初或有較多的經驗可分享。情況類同的是課室觀察，課堂質素與活動的性質和師生關係相關，可能會因在學年初或學期末進行觀察而影響結果。接近學期完結，高班（K3）教師可能專注於為學童準備銜接小一。在這些情況下，教學或會與平日不同。
35. 我們關注活動或受限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這些活動包括課堂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和家長活動。

## 主要發現和建議

以下的建議均基於研究結果。

	主要發現	建議
I.	從課室觀察顯示，由政策實施前階段至第二階段，三個因素的分數均有所上升，惟因素三（大自然與生活）在課室觀察的分數則有逐步下降的情況出現。	進一步檢視與幼稚園「大自然與生活」學習範疇相關的教學法。
II.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對學與教的影響正面。校長、教師和家長都表示學校在教學中有應用課程指引所強調的「從遊戲中學習」。而如何實踐自由遊戲對一些教師和家長來說，仍是挑戰。	進一步為幼稚園提供自由遊戲方面的專業發展活動和支援；識別幼稚園的良好經驗和鼓勵幼稚園間的經驗分享。
III.	幼稚園能回應學童的特質，為非華語學童和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更多支援。從課室觀察中可見，師生互動和照顧多元需要方面的質素有所提高。教師在各研究階段也表示對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有更大信心。	持續為幼稚園提供資助以照顧學童多樣性。提供更多支援以減少非華語家長和幼稚園之間的語言障礙，完善家校溝通和合作。
IV.	幼稚園受惠於不同的津貼，能支援教學環境和師生活動。	持續評估學校的需要，並提供不同資助，以支援幼稚園的教學質素。
V.	幼稚園重視專業發展。綜觀各研究階段，越來越多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幼稚園也會作出行政安排以支持教師參與活動。教師在專業發展活動中得益，提升他們對教學和課程策劃的自信心。同時，教師希望有更多機會參與專業發展。	繼續通過提供多元模式的專業發展活動支援教師。在有需要時，檢討持續專業發展政策，以配合業界需要。
VI.	幼稚園提供多元的溝通渠道和不同的活動以促進家校合作、家長教育和家長參與。但家長在學校活動的參與率相對較低，反映家校合作仍面對挑戰。	在幼稚園推廣家長教育和鼓勵家長參與，藉此接觸不同背景的家長，包括在職家長和非華語學童的家長。